

# 继承传统、多元发展

——论当代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

侯玮红

---

**内容提要** 20、21 世纪之交，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迁，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新特点、新发展？它在今日俄罗斯文坛上的地位如何？本文试图通过对苏联解体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深入研读，从批判现实主义的新生、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和神秘现实主义的发展这三种最有价值的倾向来分析今日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批判现实主义 后现实主义 神秘现实主义

---

现实主义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经久不息的话题。在 100 多年的发展史上，它历经曲折与嬗变，备受瞩目和争议。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伴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的剧烈震荡、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迁，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继承、深化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又吸纳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逐步走上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本文试图通过对苏联解体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深入研读，从批判现实主义的新生、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和神秘现实主义的发展这三种最有价值的倾向来分析今日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

## 坚守与深化：批判现实主义的新生

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的。高尔基认为：“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我们一定会承认：在各个时代的文学中，大都对现实采取批判、揭发和否定的态度，而且愈是接近我们，这种态度愈是强烈。”<sup>①</sup>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尤·鲍列夫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第四卷中也提出一个观点：“俄罗斯文学中一切好的东西都生来就具有批判性、与现存事物秩序相对立。”<sup>②</sup>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判断不无道理。在黑暗深重的 19 世纪，

伟大作家深刻批判专制制度，为人民的自由解放发出呼声，构筑了举世公认的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即使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定为一尊、其他艺术形式都被禁锢之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并未消弭，而是作为潜流在默默发展和丰富。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在长期沉闷停滞的局面下，道德暴露和哲理探索小说异军突起，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类作品避开政治，以道德题材为主题，揭示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和道德危机。其中，以尤里·特里丰诺夫为代表的“莫斯科小说派”偏重于城市日常生活，对城市市侩卑劣、龌龊的心理及其利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和无情的批判。而以拉斯普京为代表的“农村散文”则复兴俄罗斯古典现实主义传统，在暴露现实生活、尤其是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对集体农庄和国家发展方向提出质疑时，将目标指向当代人的道德性。苏联解体后，目睹社会政治的动荡不安、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农村散文”作家和其他一些传统派作家更加不满现实，文学表现出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强烈批判的态度。以帕夫洛夫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作家继承 19、20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无情揭露和抨击。这些倾向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批判现实的力量，它标志着今天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生。

新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现实所进行的批判更加彻底，更加大胆。如果说 70 年代的“农村散文”还仅局限于揭露社会的某些弊端，指出人道德的败坏，着重于对人的道德领域进行哲理探索的话，那么新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经扩展到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现实的质疑、

否定和批判。如果说“农村散文”作家还只是开始寻找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方案并且看到了希望的话，那么新型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则发出了国家危亡的痛心疾首的呼号。两种小说在情绪上有着极大的反差。后者在情绪上更加激烈，态度更加鲜明，表达方式也更加直白。许多作品都表现出公开的政论性乃至论战色彩。阿斯塔菲耶夫的《在麦田迷路的两个小姑娘》（1993 年）、贝科夫的《玛利亚，你不要哭》（1993 年）、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1999 年）、鲍·瓦西里耶夫的《密林深处》（2002 年）、拉斯普京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2003 年）以及帕夫洛夫的军队三部曲《最后日子的故事》等作品既对苏联解体前的社会阴暗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描写与揭露，预示这个帝国最终走向崩溃的结局，又有对苏联解体后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的激烈抨击，表现出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患与沉思。其中以拉斯普京和帕夫洛夫的创作最为突出。

拉斯普京认为，“俄罗斯文学与任何一种别的文学都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的文学比艺术的含义广。它是人民命运的表达。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是为了把读者凝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整体。”<sup>③</sup>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文学为社会服务，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但是，拉斯普京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创作仍有明显的不同。他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大多以道德价值探索为主题。《为玛丽娅借钱》通过农村女售货员玛丽娅因为账目亏欠而在村子里四处借钱这样一件事，检验了全村人的道德水准，反映了冷漠、麻木、见危不救的炎凉世态；《最后的期限》通过农村老太太安娜弥留之际子女们对她的无情厌弃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一代道德蜕化的不安和谴责；《活着，可要记住》讲述了卫国战争期间农村妇女娜斯焦娜为自己当逃兵的丈夫安

德烈感到羞愧而自杀的故事，说明人的道德观念如果逾越了对祖国、对人民负责的底线之后会落得多么可悲的下场。80年代后，拉斯普京的社会批判情绪逐渐加强，进入90年代，其作品则明显地从对个人道德的审视转向对社会的批判，明确地把批判矛头指向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制度，处处都传达出民族危亡、国家危机的几近绝望的呐喊。《谢尼亚上路了》（1994年）、《年轻的俄罗斯》（1994年）、《下葬》（1995年）、《新职业》（1998年）等中短篇小说犹如一个个窗口，展现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疮疤与阴暗。但是作为一个极富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他依然在这浓重的黑暗中寻找哪怕是一丝光明。创作于2003年的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是最能反映苏联解体后拉斯普京的思想和创作特色的一部作品，同时也是新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苏联解体之初那个艰难的年代里，女主人公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四口之家在西伯利亚安加拉河流域的一座小城中平平常常地生活着，5月的一个深夜，辍学后在自由市场上寻找工作的16岁的女儿被阿塞拜疆商贩强暴。塔马拉和丈夫一起到警察局报案，在漫长而复杂的诉讼过程中，塔马拉发现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真理只有交易。她不再相信司法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决，断定强奸犯很有可能会被无罪释放。于是她自己采取行动，直接在检察院里开枪杀死了恶人。结果塔马拉被判监禁6年。4年半后她因为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小说在塔马拉迈进家门的那一时刻戛然而止。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斯普京依然保持着与现实最灼热的接触，以极其准确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富有穿透力的激情传达了苏联解体后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塔马拉的小家里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命运，塔

马拉的亲人朋友在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中所受到的影响，共同组成了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今日俄罗斯最为真实的画面。

与以往作品相似，这部小说依然是通过发生在一个家庭的事件来表现整个社会的现状。只不过这个事件更加残酷，所反映的社会面也更加广阔，社会现状也更加严峻。小说暴露了苏联解体后的各种社会弊端：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年轻人的失教、空虚和堕落）、贪污受贿、吸毒卖淫、黑社会组织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坚守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拉斯普京在满腔忧愤地向不公平的社会发出呐喊的同时，仍没有忘记要让人民依稀看到光明的晨曦。

与拉斯普京秉笔直书、忧愤呐喊式的批判不同，帕夫洛夫作品蕴含着一种痛苦与忍耐的悲剧力量。帕夫洛夫崇尚作品的真实性，他在《俄罗斯小说诗学》一文中强调：“现实主义最根本的问题——关于所描绘事物的可靠性问题。准确些说，不是问题，而是要求。用现实的形式描写——这是按照可靠性要求建立的艺术原则。……俄罗斯小说描写的目标不是现实性，而是真实性——不仅有现实的世界，还有精神的世界，我们的欲望、感情、信仰的世界。”<sup>④</sup>基于这样的信念，帕夫洛夫的创作向我们展示了当下俄罗斯社会的真实生活——正如评论家卡比托琳娜·科克申涅娃所说的那样，“从开始到结尾都是——生活，活生生的生活。”<sup>⑤</sup>他直面俄罗斯民众生活中的苦难、不幸和贫困，淋漓尽致地描写那些丑陋和肮脏的东西。

这是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极度匮乏的世界。作者在这样一个黑暗到极限的世界中展示那些被社会抛弃和歧视的人，让人的本性得到最充分的暴露和揭示。中篇小说《公家神话》（1994年）再现了那个曾经庞大的苏联帝国在面临解体时的状况：在一片荒凉、贫瘠、孤寂的草原上，有一个关押犯

人的集中营，一个连队负责看守这个集中营。贫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使得士兵们在这里根本无心服役，只是尽可能地生存。士兵们不仅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而且在心灵上也遭受着上级官僚的管制和压迫。而在孤独和不自由的程度上，士兵与犯人其实是相等的。为了生存，为了让大家能够吃饱，哈巴罗夫带领士兵把作为公家口粮的土豆分出一半来栽种。然而事情被告密，来调查情况的准尉认为这是挪用公物。因为新收获的土豆是用公家口粮栽种出来的，所以理应“充公”。准尉的恣意妄为竟使向来隐忍乐观的哈巴罗夫永远失去了生活的兴趣，后来当他在路边发现这些已经冻坏的土豆时，终于愤而离队，但不幸路遇暴风雪，冻死途中，尸首在几个月后冰雪消融时才被人发现。小说中的“公家”世界是死板的，它所代表的是冷酷无情、毁灭人性的专制制度，而哈巴罗夫大尉带领士兵种土豆，收获土豆，创造了一个“神话”的世界，这个“神话”世界则是一个充满个性的鲜活世界，与“公家”世界相对立。然而，发生在“公家”世界里的这出“神话”，却不幸被专制制度扼杀了。因此可以说，“土豆事件”引发的是一场个性与专制、自由与强权的斗争，也是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控诉。

拉斯普京和帕夫洛夫等新型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坚持俄罗斯经典文学的“训诫”和“教育”方向，坚定承担“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采取对社会生活积极干预的态度。在以前的价值体系、道德基础和生活原则被摧毁，当代社会处于全面危机的情况下，新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主动承担起了寻找新的人文理想和道德基础的任务。它在批判现存世界的不公正、不合理、不自由、不幸福之时，仍然希望通过变革达到理想的世界。可以说，在今天的文坛上，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依然具有强有力的战斗

性，而且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中显示着持久的生命力。

### 扬弃与创新：后现实主义的兴起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解体，十几年间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家们在经历着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滑坡、个人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也在经受着意识观念上的巨大冲击。一些作家认识世界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存在主义观察世界的角度；在艺术手法上，他们则吸纳了许多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但这些作品并没有完全陷入虚无，透过一种表面的冷漠我们仍可以看到后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在其悲观绝望的表象下依然不失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渴望。因此我们把这类既具有现实主义实质又融和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素的创作倾向称之为后现实主义。这种后现实主义的创作已经成为 20、21 世纪之交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当代俄罗斯文学家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按照俄罗斯文学理论传统的划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流派，总是要在描写生活现象的同时，去试图发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竭力探求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阶级归属；现代主义强调的是脱离社会的个人，从人的自身、他的潜意识、他的先天遗传类型，以及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来看待人与社会的冲突；而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理论则关注人的非理性和超理性，由此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建构自己的价值标准。在经历了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年代和众多的世事变迁之后，后现实主义作家被存在主义的某些思

想所打动，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由原来所认为的现实是可知可感的，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的荒诞感和疏离感。正如多甫拉托夫所说：“在我们出生之前——是深渊。在我们死亡以后——是深渊。我们的生命只是无边无际的冷漠的大洋里的一颗沙粒。但我们还是努力……在这地壳表面留下哪怕是一丝划痕！”<sup>⑥</sup>但是，必须看到在这些后现实主义作品中，表现出的存在主义意识并没有笼罩一切，这些作品仍透出对社会现实相当细致的分析。也许后现实主义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明确摆出人物的社会归属，但它们仍会以隐晦的方式把这些透露给读者，使读者把存在的虚无和社会的现实联系起来，进而从虚无走向实在，在揭示存在主义的思想本质时体现出对现实世界的关注。马卡宁作品中表现出的人对现存世界的逃避、人生的徒劳无意义等观念，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笔下由荒诞的日常生活情节和枯燥沉闷的重复所构成的反诗性的世界，以及德米特里耶夫的长篇小说《合上的书》（1999年）中所渗透的对于自由的理解等，都深刻体现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意识，同时又引发读者深入思考形成这些观念意识的社会现实。

后现实主义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人物的非英雄化。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那些以积极果敢的行动来反抗社会的人物不同，这些人物大多远离社会，长于思考却消极无为。也许这些反传统的非英雄正是作者心目中的时代英雄。后现实主义小说中大多是充满了各种人性弱点的人物。如德米特里耶夫的《河湾》（1995年）中那个多愁善感、有时甚至自暴自弃的医生斯涅特科夫，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夜晚时分》（1992年）中的女诗人安娜，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年）中的主人公彼得罗维奇等，都具有边缘人的特点。这些新型的边缘人物复杂而多变，他们和俄罗斯文学经典

中的“小人物”、“多余人”有相似的一面，但又有很大不同。经典中的小人物善良勤恳，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他们的不幸命运令人唏嘘，令人同情；而后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小人物则充满矛盾和缺点，他们对自由的执著追求令人钦佩，而他们的悲观厌世和犹豫不决却令人失望。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拥有深刻的自省和忏悔意识，这是后现实主义人物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19世纪的“多余人”对现实不满，总是矛盾痛苦于自身的“多余”感，但同时他们又贪恋甚至沉溺于现实生活无力自拔，因此必将无法逃脱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作者对他们大多采取同情和批判态度。后现实主义中的“多余人”却视自己的边缘性为生活的恩赐，也可以说这种边缘性更是他们自我选择的一种生存状态。《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彼得罗维奇就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的“多余人”形象。

彼得罗维奇的“多余”感与他的“地下人”身份息息相关。在苏联时代，尤其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由于政府对于文学艺术的严格控制和书刊检查机关的严厉筛查，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因为不合时宜而逐步销声匿迹。而与此同时，地下文学和艺术却发展起来。彼得罗维奇就是这样一位“地下人”。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弟弟——一位天才的地下艺术家——所受到的残酷迫害，于是自愿选择了沉默，从此不著一字。苏联解体后，一些曾经的同道人走出地下，靠贩卖昔日的经历谋取名声和利益。彼得罗维奇完全可以凭借他的才华和在地下人中的威望来摆脱穷困，改变处境，然而他依然故我，拒绝动笔。他是高傲的，傲视群生，也傲视所有的地下人。他最忌讳的就是奴性。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告密者是政权的奴仆，但苏联解体后的那些沽名钓誉者则是金

钱的奴仆。他所珍视的是内在的自由。他虽然居无定所，无家无业，形同“多余”，实际上他内心坚定，无比强大。底层只是他表面的生存状态，而“地下人”才是他的灵魂身份。他正是以自己守护自由的坚定精神在社会意识领域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无论是暴富的“新俄罗斯人”洛维亚尼科夫，还是已经退出地下的济科夫都对他怀有敬畏之心就是一个明证。所以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不仅有些欣赏，甚至十分推崇。

在风格上，后现实主义小说采取了后现代主义的“戏仿”手法，却与后者的目的及内涵不同。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利用“戏仿”、“反讽”、“拼凑”等方式拿经典开涮，让读者心目中原本建立的那些高大宏伟的形象轰然倒塌，而后现实主义对“戏仿”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借用，其内容和精神实质上则恰恰相反，它通过对经典的仿写，一方面提醒读者对今天的现实与过去的现实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却仍要为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在这个混乱世界中寻求某种精神的支撑。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夜晚时分》中，女主人公安娜·安德里安诺夫娜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同名人物安娜·阿赫玛托娃。她穷困无奈又混乱不堪的生活似乎总映衬着阿赫玛托娃在那黑暗岁月里悲苦无告的生活的影子。小说中安娜的一段自白道出了诗人相同的遭际：“我们就是用这些诗生活，因为我，你们知道吗，是个诗人，而诗人是贫穷的人群，他们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他们在被遗忘中结束生命……”小说的最后，当女主人公费尽气力把自己的母亲送往养老院，她回到家里，面对女儿、外孙等人统统离走后的一片残局。她向上帝祷告：“上帝啊!!! 救救我吧，饶恕我吧! ……阿廖娜，季马，卡佳走了，小尼古拉也走了。……请你们原谅我的眼泪”，<sup>⑦</sup>让人想起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月亮歪戴着帽子一顶，

走进屋来看见一个人影。这是个女人，身患疾病，这是个女人，孤苦伶仃。丈夫在坟里，儿子坐监牢，请你们都为我祈祷。”<sup>⑧</sup>“戏仿”将两个女诗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现实主义作家诉诸传统，重新带上经典文学人物的“面具”，穿上经典作家的铠甲，为的是保护自己在混乱的世界中免受伤害和困扰，从而完成自己在文本和现实中的历险。德米特里耶夫的《归途》(2001年)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了一位保姆的一段特殊经历。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保姆玛丽娅在商店偶然碰到几个熟人，在他们的怂恿下，这位不知普希金是何人的玛丽娅乘车来到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普希金山，在那里傻乎乎地被卷入了一场庆祝“米哈伊洛甫斯科耶的囚徒”、当地的偶像和天才普希金生日的狂欢。狂欢和痛饮过后，玛丽娅孤身一人踏上了几百里路的“归途”。路上她用自己仅剩的几十戈比买了一本普希金诗集，想以此为证据防备主人的怪罪……她当然不是普希金的保姆，但她看顾的男孩“我”，也就是日后的作家却正是凭着这本书开始了人生的启蒙。小说看上去情节简单，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普希金和他的保姆与小说中的作家和他的保姆构成有趣的对比。

总之，后现实主义在秉承现实主义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同时，又有选择地吸纳了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种结合更准确、更生动地传达出了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 传承与嬗变：神秘现实主义的发展

在当代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中，还有一种重要的创作倾向——一种带有明显神秘色彩或神秘因素的现实主义。神秘现实主义的神秘性大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描写现

实生活中的神秘现象、神秘事件，在亦真亦幻、似梦似真中表现人物对真理的探求和无所皈依的尴尬心态。一种是表现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奥秘。人物对现实不满而向往彼岸世界，而这个彼岸世界是否存在，如果真的存在它是否能成为人类心灵的港湾和最终的依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造成一种神秘的悬念。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2000年）和瓦尔拉莫夫的《沉没的方舟》（1997年）、《圆顶》（1999年）等作品都表现出这样的神秘现实主义的鲜明特点。

在《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作家在现实世界这条主线之外，同步安排了一个女主人公的梦境世界。作家解释道：“没有第二部分，我的整个小说就不存在。人物的现实生活固然使我感兴趣，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现实生活的第二种（或者第三种，随便多少！）方案。任何人都生活在一个‘实在的’现实和另一个我们所预感到的、瞬间所意识到的现实的交界点上——在梦中，在闪现的直觉中。”<sup>①</sup>小说以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生平遭际为线索，反映了20世纪以来俄罗斯所经历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及其对个人命运所造成的影响。在这个现实层面上包含着许多不能破解的生命之谜，它们都好像是一些命中注定的缘分，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小说的另一个层面是女主人公叶莲娜的梦境：现实中的人物时时在梦中出现，而梦境又对现实有所昭示，这使整部小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造成一种虚幻与现实、“界内”与“界外”瞬间的转换。叶莲娜与丈夫虽然还维持着表面上的正常婚姻关系，实际上早已没有精神的交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隔绝的夫妻关系最终迫使叶莲娜对外界彻底关闭了心灵的大门，她的记忆力逐渐丧失，她越来越频繁地遁入梦境。在梦中，她漫游“多极坐标系”中的沙子世界和过去与现在同时存在的时间舱。那里是她

摆脱痛苦的地方，也是她寻求答案的地方，叶莲娜梦中不仅想解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惑，而且还试图想象或体验那恐怖神秘的生与死的界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对于神秘梦境的描写并不是为了把读者引向对世界的不可知论，引向虚幻莫测的境地，而恰恰相反，它是为了反观现实，从另一个视角关注现实，昭示现实，而同时又增添了一种对现实的神秘的审美感受，达到神秘与现实的融和与统一。

与《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相同，《圆顶》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身体所处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精神栖息的幻境世界。连接两个世界的契机也是主人公的心灵疾患导致的幻觉。小说在对主人公一生经历的描述中不时夹杂着脑海中出现的神秘幻觉，这样既实现了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又反映了当今一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国家巨变之后的反思。他们在这种反思中走向绝对孤独，并在绝对孤独中开始面对上帝，开启了人世间之外的另一种希望、另一种生活，似乎那里才是一片没有谎言、没有罪恶的纯净之地。这类作品实际上又回到了一种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对世界和人生的阐释。

但神秘现实主义从本质上看依然是现实主义。虽然小说写到了现实中的一些神秘现象、神秘事物，或者在作品营造的氛围、在表达形式上具有一些神秘因素，给人以神秘的审美感受，但这些作家写作的根本宗旨都不是要宣扬神秘主义，而是为了对社会现实更好地进行反思。神秘现实主义作品是作家对现实中那些不可言传、不可思议事物的思考，是对人的生命与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探究，也是在现实的悲观绝望中对某种超现实力量的希望和寄托。因此，神秘现实主义是作家既关注现实、叩问现实、又超越现实、

获得心灵提升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依然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神秘现实主义在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和社会背景之下出现，是源于当代人不满现实和渴求理想的极端苦闷与彷徨的心理状态。然而今天的神秘现实主义又与以往有所不同。过去那些创作寄希望于人世之外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坚信有救赎的可能，所以幻想中的世界往往是光明、美好的，而当下的这些神秘现实主义作品则对超自然神秘力量时时流露出怀疑。作品中的人物既寄希望于这种力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持否认态度；既向往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又怀疑它的存在。于是不得不置身于现实与非现实、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尴尬处境。鲁迅当年的诗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或可看作是当代俄罗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疑惑和徘徊心态的一个写照。

著名作家格·弗拉基莫夫在获得1995年俄语布克文学奖时说道，他的《将军和他的部队》这部长篇小说所采用的仍是那个“善良而古老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任何对于现实主义的离开都会以悔过地回归现实主义而结束。这棵唯一深入植根于生活的树干将会永远挺立，永远给绿荫婆娑的树冠以滋养。”<sup>⑩</sup>回顾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流变史，考察当代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相信，现实主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源于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的强烈关注，对其他文学流派与思潮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的不断借鉴与吸收。而批判的精神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如一的本质，争取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它永远不变的追求，在

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多元发展则是它的道路和方向。

- ①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55页。
- ② Борев Ю. Б.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См.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ИМЛИ РАН, “Наследие”, 2001. Т. 4. С. 417.
- ③ Слышу гул подземной Руси……См.: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Г. Дети 1937 года. М.: Инфорпечать ИТРК, 2001. С. 78.
- ④ Павлов О. Метафизика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Октябрь. 1998. №1.
- ⑤ Капитолина Кокшенёва. Больно жить//Москва. 2000. №5.
- ⑥ Цит. по: Минералов Ю. 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90 - 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М.: ВЛАДОС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2002. С. 149.
- ⑦ 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夜晚时分》，陈方译，载《世界文学》2005年第5期，第120页。
- ⑧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乌兰汗译，乌兰汗编《爱——阿赫玛托娃诗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
- ⑨ Татьяна Мартюшева. Мировой компот. См.: <http://www.fan.izh.com>
- ⑩ См.: Лейдерман Н. Л.,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2 - х тт. Т. 2. М.: АСАДЕМА, 2003. С. 534.

[作者简介] 侯玮红，197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近期的论文有《论马卡宁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谈当代俄罗斯“作者小说”》。

责任编辑：刘雷岚